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第二辑

房学嘉 周云水
冷剑波 黄建阳
主 编

张弼士为商之道研究

ZHANGBISHI WEISHANG ZHI DAO YANJIU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第二辑

-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出版基金项目
- 梅州市人民政府客家研究学术出版基金项目
-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从契书金石看客家社会文化的变迁：以粤东梅县为重点分析（18—20世纪初）”成果之一
- 梅州市政府重点项目“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成果之一

张弼士为商之道研究

房学嘉 周云水 冷剑波 黄建阳 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弼士为商之道研究/房学嘉, 周云水, 冷剑波等主编.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5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第二辑)

ISBN 978 - 7 - 5623 - 3683 - 9

I. ①张… II. ①房… ②周… ③冷… III. ①张弼士 (1841—1916) —生平事迹 ②张弼士 (1841—1916) —企业管理—经验
IV. ①K825.38 ②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1920 号

张弼士为商之道研究

房学嘉 周云水 冷剑波 黄建阳 主编

出 版 人: 韩中伟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 //www. scutpress. com. cn E-mail: scutc13@scut. edu. cn

营销部电话: 020 - 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策划编辑: 罗月花

责任编辑: 龙 辉 毛润政

印 刷 者: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89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 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邱国锋

梅州是世界客都，是五千多万客家人的心灵之都，悠久的历史在梅州积淀了浓厚的客家人文资源。梅州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客家围龙屋；也有种类繁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客家方言、客家山歌、广东汉乐等。广东第一才子宋湘、与徐悲鸿齐名的林风眠、现代诗的创始人李金发、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数学家丘成桐，都是梅州人。梅州人黄遵宪、丘逢甲写的诗歌，被温家宝总理两次引用。近 60 年来，梅州出了 25 位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客家民俗在梅州，爱国爱乡在梅州，崇文重教也在梅州。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是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自 2006 年成立以来一直得到梅州市委和市政府的全方位关心支持。嘉应学院有一大批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专家与学者，20 多年来的积淀形成了一个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团队，成绩斐然。从研究成果看，客家研究院在 2008—2009 年出版了《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第一辑）8 卷，论证梅州是世界客家文化之都。在此之前，梅州还出版了客家与梅州书系等。一大批研究成果的问世，充盈了“文化梅州”的浓厚内涵。从服务地方看，客家研究院近年来先后承担梅州市“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相关问题研究”及“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等，承办第二届世界客商大会客商论坛，并于 2011 年 11 月促成“客商研究院”的诞生。

梅州是重点侨乡之一。梅州三百万客家华侨在海外传播客

邱国锋，嘉应学院院长、教授。

家文化，深深地爱着客家文化，他们是研究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力量和资源。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客家商人漂洋过海，四处开拓，足迹遍布全球，在各行各业中都涌现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和卓越成就的杰出人物。如“南洋开埠先锋”罗芳伯、叶亚来，新加坡“万金油”大王胡文虎，“领带大王”曾宪梓博士，“人造革大王”田家炳先生，等等。广大客家商人闯荡世界，生生不息，卓有建树，铸就了客家商人乃至全球华商网络的灿烂辉煌。

梅州是一个农业大市，是华南乡村社会的典型区域。显然，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起来的区域是关注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农村问题的理想标本。两三百年来，大批到海外的客家人把海外文化带进来，与本土的原生态文化相结合，这样构成的农村与原本的农村意义不一样，烙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许多地方都有西洋与传统风格相结合的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开展梅州客家文化研究，无疑是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开启了一个新视角。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完善促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传承创新客家优秀传统文化，是加快建设富庶美丽幸福新梅州的内生动力。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第二辑）8卷所涉内容涵盖了客家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凝聚了海内外诸多学者的智慧和汗水，既标志着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正在走向另一个新的高度，也预示着更多的学术人才开始投入客家研究，为“文化梅州”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我们期待着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能够乘势而上，继续出版更多的研究成果，不断挖掘整理客家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丰富“文化梅州”的内涵，为进一步提升梅州的客家文化生产力和竞争力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是为序！



目 录

有关张弼士的史学考证

张弼士、晚清侨务与槟榔屿绅商的神道设教

——从公共外交与召唤侨资两个角度解读 王琛发 (3)

张弼士：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视阈中的“客商” 曾令存 (42)

岭南大学张弼士堂建堂始末 余齐昭 (60)

张弼士南洋商业侨务活动史实考释 刘奕宏 (71)

张弼士政商关系研究

张弼士南洋创业与结识英才

——以张弼士与张榕轩、张耀轩的关系为例 ... 韩信夫 (87)

寓商于农：张弼士“兴垦”观探析 刘正刚 李贝贝 (99)

张弼士与黄遵宪交谊考述 郭真义 (117)

张振勋担任槟城副领事的人脉关系考 魏明枢 (128)

客家文化与客商研究

浅析客商的“儒商”精神

——以张弼士为例 杨宏海 (147)

张弼士与晚清护侨招商政策的形成 李吉奎 (162)

张弼士与客家社会文化 肖文评 (174)

关于张弼士研究的若干思考 房学嘉 (191)

张弼士与张裕酿酒公司研究

“张裕”崛起之道的人类学探析

——以企业的文化构建和品牌扩张为例 周云水 (201)

张弼士的酒业发展观及其葡萄酒业成功实践的历史贡献与

启示 许良政 许济洋 李晓卫 张天炎 (229)

弘扬爱国精神 推动张裕可持续发展 傅铭志 (247)

内化客家文化的张裕经营之道与企业持续发展的现代逻辑

..... 黄兴年 刘祥霞 (252)

张弼士商道与客商精神研究

财富之道

——张弼士经济伦理思想刍议 林振武 (275)

张弼士商道与客商精神 幸让新 (289)

张振勋的战略管理思想探析 刘家明 (303)

张弼士商道理念探析 许淳熙 (317)

张弼士爱国思想研究

更深刻认识与理解张弼士一代民族实业家 谭元亨 (329)

21 世纪客家商道与中华民族之振兴

——以张弼士商道为例 刘焕云 (339)

张弼士商道与客商精神 黄杰明 (355)

论张弼士的慈善公益活动及思想 古惠文 (372)

有关张弼士的史学考证



张弼士、晚清侨务与槟榔屿 绅商的神道设教

——从公共外交与召唤侨资两个角度解读

王琛发

引 言

晚清诸大臣之间，张之洞最早注意到槟榔屿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曾在《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提出：“槟榔屿一埠人才聪明，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①又建议在此地“设书院一所并购置经书发给存储，令各该领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②。本来东南亚英、荷属地并非没有私塾，英、荷教会与政府所办的学校亦有包括华文教学之举。但张之洞的奏折显然另有考虑，他要在槟榔屿办学，目标是“使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凡有气血未必无观感之思”^③。这是明确建议清王朝重回列强所殖民的明清两代旧藩

作者简介：王琛发，马来西亚孝恩基金文化执行总裁、马来西亚执政党中央党校校长、欧亚大学教授、马来西亚道教学院暨槟城道协主席、华侨大学客座教授。

① 张之洞：《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收录于张煜南辑：《海国公余辑录》卷一《槟屿记事本末》，中国梅州：张煜南曾孙张洪钧伉俪 2005 年影印再版（原书自序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出版于光绪二十七年），第 96 页。《槟榔屿志略》出版在槟榔屿设领之前，《槟屿记事本末》是张煜南任职槟榔屿副领事期间辑录编著的成果，转载张之洞这一份奏折，可见其思想指导之影响。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第 97 页。



属，经略南洋；其策略是在英、荷属地海域之间，选择紧扣马六甲海峡对西方出口的槟榔屿，规划文化教育长期落地生根，由点到线，带动南洋华人从文化、思想到国朝认同的归属感。

张之洞的设领主张，到张弼士于1893年出任驻槟榔屿副领事，方才逐步实现。以后，自1904年农历九月起，在清廷先后任命张弼士为督办闽广铁路大臣、南洋商务大臣期间，晚清忠臣在西方列强的殖民版图上规建中华文化的梦想，反映在张弼士支持的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上，是客家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城五属同仁于宣统元年修建行宫的门前石柱对联，颂扬传说中比英国殖民者更早开拓槟榔屿的大伯公：“我公真世界畸人，当年蓑笠南来，荆棘披榛，亟为殖民谋得地；此处是亚欧航路，今日风涛西紧，持危定险，藉谁伸手挽狂澜？”^①此时，张弼士也以清朝大员身份给同年扩建的祖庙送去“丕冒海隅”匾额，在英殖民土地上再次重申华人开拓主权的论述。

张弼士所赠的匾额，至今悬挂在海珠屿大伯公庙的庙堂正中，由于光线阴暗和字迹受到烟熏而模糊，一直缺乏文献转载。在庙前的石柱上，曾经继张弼士担任清朝驻槟副领事的张煜南也以“钦加头品顶戴侍郎花翎”的殊荣身份题写对联，其文说：“君自故乡来，魄力何雄？竟辟榛莽蕃族姓；山随平野尽，海门不远，会看风雨起蛟龙。”两位先后担当朝廷驻槟副领事的官商，各自以官衔署名，用文字交织出他们对先贤英灵的崇敬，表达他们对华人开拓南洋的定位。两处对联，不论是在“风涛西紧”之中质问“藉谁伸手挽狂澜”，或者是在大海之滨北望中原，冀望“海门不远，会看风雨起蛟龙”，事实上都是“神道设教”，足可反映清政府、他们本身以及南洋华人共同的主流意识。

回顾历史，张弼士向朝廷请封大伯公的说法，较为人知，后来许多流传的文字都有提及。其中，当地文人汤日垣为海珠屿大伯公

^① 本文所提到的现存碑铭文物，凡属笔者现场抄录或拍照，概不作注解。以下同。

庙撰写庙史记载说，张弼士提了一万两庙款向清朝请封其“嗣伯祖父”张理为大伯公，还导致张弼士侄孙婿邝国祥后来重撰庙史时隔着时代反驳，说：“查张大仆系用嗣伯祖父名义，请封五属人士已都公认大伯公张、丘、马三公……而区区岛国之嗣伯祖父，亦未必能增光于公，而其所以愿巨金为之请封者，盖为灾黎以尽其子侄之职责耳！”^①

不过，如果我们能将张弼士向清朝请封大伯公的事迹提升到超越“家族殊荣”或“地方庙史”的视野，也许更能接近张弼士身处晚清海外华人社会的心境。后人可能忽略，张弼士有生年间，自他在1893年出任清朝驻槟榔屿首任副领事，到辛亥革命发生之前，他在槟城当地所作的贡献，居然都集中在宗教事业，至今成为地方文化遗产，而且不外是两件事：一是为当地神明香火申请皇上封赐的殊荣，二是扩建庙宇。

今天看来，晚清政府当年通过张弼士努力推动槟榔屿的华人的宗教建设，可能并非随机性的结果，是源自晚清涉外官僚对当时国力、华侨华人与国际形势的考虑。用现代的词汇形容，这涉及了“软实力”与“公共外交”两个范畴。

事实上，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李鸿章于五月初五所上的一份奏折附片上，已经提到说，张振勋（弼士）当时初为副领事，曾经邀集“中国绅商道衙郑嗣文”等人赈济山西边外旱灾，事后各人不敢邀功请奖，仅是提及“该埠平章公所供祀关帝夙昔灵应”，要求“可否奏请御书匾额一方”，当时光绪朱批“着南书房翰林院书匾额一方交李鸿章祇领，转发郑嗣文等，并嘉奖。钦此”^②。所谓“平章公所”即是当时槟榔屿与邻近地区华人的公众

① 邝国祥：《海珠屿大伯公考》，载《北马永定同乡会新会所开幕暨42周年，青年团9周年纪念庆典特刊》，槟城：北马永定同乡会，1992年，第231页。客家五属组织在1949年为海珠屿大伯公庙确立新董事部结构，原文为新董事部的新章程序文。

②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藏《宫中档及军机处档折件》，列号132288档，具奏人：李鸿章，事由：“檳榔嶼平章公所鄭嗣文等請求御賜關帝匾額。”（本文所有引用的《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折件》，蒙甘德政君親往台北故宮博物院查閱、發現與影印）。

组织，对内以“平章政事”的态度调解纠纷，对外则形成向英殖对话的共同机构，这是从会党/方言群分裂时代演变为协商体制的组织，其初期领导人多涉及洪门帮会，崇尚关帝忠义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①如上述“郑嗣文”，其实就是原籍增城的客家矿家郑景贵，在马来亚拉律内战期间领导粤语系帮群的“海山”会党。^②“平章公所”或当地人后来所称的“平章会馆”，演变至今成为“槟州华人大会堂”，至今保存有1886年馆厦落成的《创建平章公馆碑记》，内容说“所愿一堂坐论，睚眦胥黜，百代祥和，界疆勿限”。李鸿章交给张弼士转发给公所的匾额和嘉奖文书虽已失落，但至少文献证明张弼士曾经做过当年南洋华人会党领袖的工作，到将“忠义”道德从难以实现的“反清复明”寄托在当时唯一合法的政府，进一步促进了民族意识的统一，这已经让张之洞当年《奏槟榔屿宜添设领事疏》的主张向前迈了一步。

但张弼士通过支持槟榔屿华人信仰扩大清王朝在南洋的影响，最明显发生在1904年。

这一年的农历四月，槟榔屿士绅先借平章会馆试办学校；十月，商部奏请由张弼士管理该校事务，并带给槟榔屿朝廷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光绪皇帝御笔题字的“声教南暨”；翌年五月，张弼士领着清朝“商部奉请供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南洋学务大臣太仆寺卿”的头衔，到槟主持悬挂“声教南暨”御匾及珍藏御赐图书，他又带头捐款，促成当地闽广士绅联合建立南洋最早的现代化学堂“中华学堂”。^③中华学堂依据张之洞等人于1903年

① 陈剑虹：《平章会馆的历史发展轮廓》，载槟城华人大会堂特刊编委会编：《槟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3年，第135～139页。

② Wong C S. (1963).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Dewan Bahasa dan Kebudayaan Kebangsaan, Ministry of Culture. 77-78, 104-107. 亦参考邝国祥：《郑景贵其人》，载邝国祥：《槟城散记》，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8年，第108～113页。

③ 陈育崧：《马华教育近百年史绪论》，载陈育崧著：《椰荫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第229～230页。



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办学，内里设立孔庙，是延续传统信仰文化的现代学堂；其校规简章第四章规定“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孔子先师诞，并清明、端阳、中元、中秋、冬至，各放假一天”，第六章又规定“本校向常开学教学之日，及每月朔日，由监督暨教员办事诸人员率同学生，诣至圣先师前行三跪九叩礼”。^①至此，张之洞想要南洋华人子弟“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的理想终于实现。

同一年，通过张弼士的斡旋，朝廷于九月初正式颁布《龙藏经》给极乐寺，带来了光绪皇帝题的“大雄宝殿”和慈禧太后题的“海天佛地”，并且下谕极乐寺开山长老妙莲法师“敕赐极乐寺禅寺钦命方丈，御赐紫衣钵盂杖銮驾全副，回山护国佑民”，之外也谕令“该馆领事暨人民等一体虔奉，加意保护，毋得轻亵”。^②极乐寺自此由山区小庙发展成今日东南亚最大的汉传佛教丛林，山上至今留存着韦宝慈于1907年撰写的《创建白鹤山极乐寺碑》，上边记载，妙莲长老在乙巳（1905年）季秋“奉旨南旋”，即在当地广开四十九日连宵法会“表扬帝德，普拯沉黎，并利人天”。清廷通过“敕赐”极乐寺，向华侨表明国家“护国佑民”的宗旨已延伸到南洋。

关帝、孔子以及佛教信仰都是源自中国本土，被那些到海外开拓的华人作为家乡文化的象征，带到海外成为彼此认同的凝聚力纽带。同时，海外华人也是通过香火传播落实了“转他乡为故乡”的集体意识，在异地重建他们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新开发地方。这一信仰意识的背后，是把古圣先贤的传统联系到当今朝廷的法统。国家的宗教文化政策封赐海外华人信仰，无疑是为了表达朝廷对海

① 转引自陈育菴：《马来亚华侨新教育的发轫——槟榔嶼中华学校创立经过》，载陈育菴著：《椰荫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第264～266页。

② 王琛发：《极乐寺〈龙藏经〉——反映晚清华侨政策的一瞥》，载《无尽灯》季刊第164期（马来西亚槟城：马来西亚佛教总会，1999年4月至6月），第27～30页。

外华人的支持。朝廷支持交叠在列强政治版图之上的海外华人的信仰版图，在精神上鼓舞了当地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果说，关帝、孔子和佛寺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么，到了朝廷封赐象征南洋华人开拓先贤的大伯公，又无疑是承认了华人的南洋开拓是国力南进的“法统”象征。这不但是“走出去”，而且还是“收回来”。

列强、华民、槟榔屿：晚清护侨政策 转化为软实力的模式

力钧《槟榔屿志略》卷三《使守志》转抄了张之洞《筹议外洋各埠捐船护商疏略》，其中有说“出洋华民数逾百万，中国生齿日繁，藉此消纳不少，各国渐知妒忌，苛虐驱迫接踵效尤”。^① 张之洞建议朝廷必须设立领事以“加意抚循”回应，华民“自然固结为南洋无形之保障”。^② 力钧的《槟榔屿志略》刊印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清朝在槟屿设领之前，他传抄张之洞之文字，可见其心里赞成。此前，张之洞为了购买军舰护侨以及维持新加坡和吕宋领事馆，曾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奏朝廷，建议向南洋华人推售官衔，“奖以虚衔封典翎枝，专充领事经费”。^③ 可是，弱国外交还得看他人面色。1887年，清朝第三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的好友李钟钰访新，他批评英殖掠夺大清领事权力，设立华民护卫司也是为了事事为难华人。^④ 清廷出使英、法、意、比钦差大臣薛福成则在1890年报告皇上：“各国开荒为巨埠，专赖招致华民，而洋人实属寥寥。一经我设立领事，彼不免喧

① 力钧：《槟榔屿志略》，双镜卢集字板排印，光绪十七年，卷三，第4页。

② 同上注。

③ 张之洞：《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载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第607～612页。

④ 李钟钰：《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第5～6页。



宾夺主之嫌，又碍其暴敛横征之举，所以始必坚拒，继则宕延。”^①

五年后，清朝海军甲午战败，国势衰弱更甚，张之洞的军舰护侨留待后人实现。到了1901年的新马华人子弟就学统计，每2000名孩子进入中文学塾，就有600人进入英校。^②当部分父母重视靠拢英殖的现实利益时，民族主义者却察觉未来一代文化转向的忧患。张弼士在中华学堂疾呼说：“西国之人，在各埠设立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历史、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③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清朝一次次给槟榔屿送去光绪题字的重要意义。从张弼士这一系列看似偏向信仰的活动，可知他主观上并不只是把自己定位为商人，这也有助于后人重新建构晚清侨务政策与弱国外交的另一面形象。

从战略的角度看，晚清朝廷运用其在南洋华人心中尚存的权威，以皇上的名义颁赠各种荣誉给缘自中华的南洋华人信仰，其实是正在把海外的信仰活动套入以清王朝正朔的主导意识，鼓励南洋华人正视他们与中国国内拥有“共同信仰”。尤其当西方国家不愿清廷在他们的殖民地涉及政治，甚至不让设领，清廷派遣官员到当地的庙宇访问、题字，赠送各种皇家赐品，实际上也是睦侨，是在列强殖民地的政治领域以外，把皇朝认同推及到宗教领域。信仰生活乃至信仰活动本来就是人们既有的集体事务，朝廷支持当地建立或扩建信仰场所，在南洋民众的信仰意识中嵌入“皇恩浩荡”的意象，其实可以做到“本小利大”和“双赢”。朝廷付出的代价不大，胜在能辅助受到封赐的一方树立威望，顺水推舟又将“国朝”印象普及庶民百姓。

① 薛福成：《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载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34页。

②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马来西亚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1年，第23页。

③ 陈育崧：《马华教育近百年史绪论》，载陈育崧著：《椰荫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第230页。

以《槟城鹤山极乐寺志》记载为证：极乐寺的妙莲长老自光绪乙未（1895年）获得张振勋与张煜南首肯成为建寺元首，再找来先后继任副领事的张煜南、谢荣光、戴喜云，加上郑嗣文，极乐寺就名正言顺有了五大总理支持。但诸僧人要筹够钱建寺，也不能单靠这五位绅商名人，还是要“托钵生涯亦积岁不休，顾其芒鞋所至，除英属七州府，而外如仰光、荷属苏门答腊一带，及暹罗所领各地共一百七十余埠善缘”^①，等到《龙藏经》等清王朝的钦赐物件下南洋，寺方“又付迎请藏经费用共银五千捌百元以上”^②。可见，极乐寺在正名为“敕赐极乐寺”以前，为“敕赐”花钱的还是极乐寺。可是，一旦妙莲奉旨还山，上述《创建白鹤山极乐寺碑》所说的四十九天昼夜法会“表扬帝德”肯定是远近皆晓，原来僧人前去筹款的170余个市镇的施主也都会奔走相告，碑文说“自是岛氓侨士乐趣真宗，异国王公喜登胜地”。今天鹤山上犹见五块志年光绪丙午三十二年（1906年）的《敕赐极乐寺功德碑》，上边刻录着当年法会的劝捐名单，最首位张弼士以“头品顶戴花翎侍郎銜太仆正卿”之衔领捐三万五千元，其余各处捐款密密麻麻。可见光绪题字的“大雄宝殿”确实象征着两地佛教重续文化纽带，海外民心一旦受到鼓舞，就筹款建成当年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大雄宝殿。

如果按照当代“新公共外交理论”（New Public Diplomacy）的论述，它更关心国家如何主导多领域多层次的外交，以及如何通过民间单位实现外交作用，也重视各方民间实践者以“软实力”构成外交行为，构成“联系网络的环境”（Network Environment）以及形成新的沟通方式。^③ 在中国积弱的时代，出动皇帝题字写

① 释宝慈：《槟城鹤山极乐寺志》，槟城：极乐寺，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年），载卷七《外记·极乐寺缘起述略》，总第85页。

② 同上注，载卷八《外记·助创本寺芳名录及建筑费》，总第104页。

③ Melissen, Jen. (2006). "Introduction", in Melissen, J. 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